

第

3

代

学

人

自

选

集

学

1
第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周振鹤 著

学
腊
一
十
九

學

周振鶴 著

臍

山东教育出版社

加

王元化

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腊—十九 / 周振鹤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2-4

I . 学… II . 周… III . 历史地理—文集 IV .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02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学腊—十九

周振鹤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2023919 传真: 2011455

网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规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张: 9.875 印张

插页: 5 插页

字数: 217 千字

书号: ISBN 7—5328—2672—4/G·2458

定价: 1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学腊一十九

1983年，我在复旦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科方面的头两名博士之一。那一年，在我们前面还有十八人被授予第一批理学与工学博士学位，因此《新民晚报》邀集在沪的部分博士学位获得者撰写随笔，刊登于《十日谈》的栏目上。当时我感谢但婉辞了这一邀请，因为我觉得自述与回忆性的随笔还是等上了年纪来写才更显得从容。当然，过去的学者在我们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个年纪前后已有自传性的文字问世，《三十自述》与《四十自

述》就是突出的典范，但梁启超与胡适在写自述时都已经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而且其时他们的名气已如日中天，所以他们有资格在人生的中途就来做一回顾，而我却是在人生的中途才刚刚切入一个全新的学术世界，并且可以预料，竟我一生之力也不能有中人以上的学术成就，所以当时认为自述之类还是晚点写为好。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不免有点矫情。因为一代有一代的风气，愚者有愚者之一得，就降低标准写写不入流的总结亦未尝对自己今后的长进没有好处，当时真是辜负了晚报编辑的一番好意。所以这次趁本书结集，也不妨先回头看看过去。

我从小是中人资质。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时考了全班第十六名，我父亲很满意，对我母亲说，全班有四十来人，十六名已在中等以上，可以了。福建人读书早，我不到五周岁时已经上学，倒不是因为上学早，才对我要求不严格，而是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双亲就从来不对我的学习施加压力，不对我要求过高。我很感谢父母亲的明智，如果说我今天还能在学术领域留下一鳞半爪的话，首先就要归功于他们的无为教育。我的学习成绩直到初中才有起色，到了高中才进入班上前三名的行列（当然，由于政治的原因，我的好成绩并没有给我带来名牌大学的好专业）。对于这种变化，我的父母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好像我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成绩似的。这种没有压力的环境，培养了我的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求知欲望特别强烈。什么书都想看，什么事都想懂得。从小时候迷小人书，到中学跑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手头总是有不同的书在读。尤其在初中一年级我受到一位同学的影响，开始看起大部头来以后，更是囫圇吞枣地大嚼世界名著，而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今天的学生也许不会相信（因为他们即使想看也没有时间），我

们在那时不但熟读高尔基的大部分著作，而且也知道姓托尔斯泰的大作家并不止一个，《复活》要看的，《苦难的历程》也要读的。至于那些才子书，当然不会放过，除《水浒》、《三国演义》是津津有味外，《红楼梦》也捧起来乱读一气，自然是读不懂，后来到大学才又补了这一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则是另一个阅读热点，而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位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十日谈》，在当时等于是打开了读禁书的大门。

前不久有一位成绩很好的本科生跟我谈起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体会，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周老师，你读过这本书没有？”我说：“读过的，这些书我们在高中时都完成了。”的确，我们当时受到的高考压力较小，有大量的时间阅读课外书，而且一般都是从文学书籍读起。初中主要读俄苏文学，高中就读西方名著。当时的高中不叫语文课，而是分为文学与汉语两门，文学的教材是按文学发展史来选编的，纯粹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小说、桐城古文自然要入选，即便《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也都有范文选读，我就是从这些史学名著的片断中对历史开始感到兴趣，到了大学以后就转入大量阅读史学原著，无意中为后来报考历史地理学作了准备，否则我是无法在一个多月里就复习完研究生的应试科目的。当然比起我们的老师来，我们的经史子集是少看了许多，而比起太老师垂髫之年就读《尚书》就更加汗颜。但我们到底是努力读了书的，生怕虚度了光阴。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当然也学了许多前辈师长未曾接触到的新知识。

当然要学会读书，是要克服许多障碍的，这里仅举一小例为说。记得初中时有一次到厦门图书馆看书，发现参考室的玻璃橱里有一本很大的书，封面上是两个大字：台湾。我要求管

理员借给我看，想不到回答却是冷冰冰的：“那是日文的。”他打量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应该到儿童阅览室去的怎么错走到这里来了。我似乎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明明是汉字，怎么却是日文的？因此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中。后来进入厦门大学，学的是俄语，但当我知道教职员有个日语进修班时，我就向教务处要求旁听。教务处担心学生负担太重，不肯答应。我于是只好偷听，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不过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听课的人越逃越少，最后只得停课。但我对日语的兴趣已经不可遏止，后来浅薄的日语能力就是靠这点基础自修起来的。当然我后来没有再到厦门图书馆去借那本《台湾》来看，因为我发现那样的书厦大也有。

我中学里对所有的科目都无偏好，数理化、文史外一碗水端平。要论单科成绩倒是外语最好，无论是只在初中学了两年的英语，还是在高中学了三年的俄语，都是班上最好的，也是自己各门功课中最好的。但我并未去考外语系，当时风气如此，以为外语只不过是工具，没有当专业来研究的道理。我大学考的是理工科，并不表明我特别喜爱数理化，而是因为数理化成绩好，自然不会去考文科。同样，我考研究生改行搞文科，也不表明我厌倦理工科，而是对我十几年的无需创造性的技术工作的不满而静极思动的结果。由于对学问无所偏好，使得我在报考研究生时一度举棋不定，不知哪个专业适合于我。说来见笑，最后选定历史地理学，只是因为初试的专业科目是中国通史、中国地理与古汉语，我比较有把握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做好考试准备，并非我对该专业情有独钟，或对先师谭其骧先生十分崇拜。事实上我对该专业无所了解，对其骧师几乎毫无所知。想不到这种随机的选择却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进入了一个与我以前经历完全不同

的另一个世界。

一个人遁入空门，对于其过去的俗家生活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所以僧人不但有实际年龄，还有僧腊，也就是出家以后的年龄，以记载这一变化。对我来说，1978年也是个标志性年份。在这以前，我学的和用的都是理工科范围里的东西，我个人始终只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从未作为主体来认识身在其中的这一个人文世界。在这一年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我由研究生的学习开始，涉足历史地理学领域，又从而融入历史学，并旁及文化研究，进入到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境界。我感到了我在，因为我思。当助理工程师的时节，也有思想，但那是想如何与客观物质世界奋斗（可列于毛泽东规范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范畴中），至于与客观的精神世界或主观的精神世界奋斗（这自然是与人奋斗了），却是没有思想的，如果有也是奉命的批判或自我批判。或者说，我在十九年以前所接触到的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即使看到种种思想批判，那也是物质型的“运动”而不是精神型的变迁。直到1978年，我才真正发现了一个人文世界的存在。从那时起到现在，时间过去了十九年，如果套用僧腊一语，可以说是“学腊一十九”，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之作为这本文集名字的缘故。

进入历史地理领域后我在两个方面感触至深，一是治学目的，二是治学方法。我想把这两方面感触稍作铺张。所谓治学目的是指这样的问题：做学问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致知还是致用？有人将这看成是西方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分界，虽不确切，但有一定道理。中国人虽不以致用为做学问的全部目的，但至少是以致用为第一目的，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是主张只办理工科大学。以致用为求学问的终极目的，必然影响学术本身的发展。学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表面看起来不一定会

有用，但现在无用并不一定表明永远无用，直接无用也许间接有用，这一学科分支无用，另一学科分支也许有用。否则实在不必有数学家穷毕生之精力去证实哥德巴赫猜想，那似乎离实用非常之遥远。职是之故，做学问应以求知为目的，而不宜以求用为归宿。章太炎曾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在济民，不在干禄。其实这是当时相当多学人的共识。

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沿革地理是研究河流水道和疆域政区的历史变迁的学问，到现代则分别衍变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分支学科。沿革地理之学古来就有，但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发展成为一门大学问。按照明末清初以来的观点，凡是研治实学都是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治史地治小学都是有用之学。但到了近代，因为受到坚船利炮的打击，痛定思痛，致用的范围缩小到只指器用，即直接与富国强兵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实用性学问。渐渐地，纯学术性的史学、地理学与小学就被当成是虚学而不是实学了。

历史地理学情况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因其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变迁，与现实生活关系似乎不大，具有较浓的纯学术气味。但具体地说，其各分支又有所差别。其自然地理部分因为研究河流湖泊海岸线变迁，研究气候变化与灾害过程，能为河流治理、企业选址、灾害预报提供参考，因此比较受到重视。其人文地理部分因分支众多，待遇不一，其中经济地理（包括人口地理）与国计民生关系比较密切。政治地理中的疆域变迁内容，与边界争端有关，也较重要；但行政区划变迁似乎用处不大，譬如说，研究两千年前的行政区划是什么样子，与今天有何相干？至于文化地理研究则似乎毫无实用价值了。但是当我成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以后，我发现这里的学术研究是以求真为目的，以致知为目标。追求的是你

的研究是否真正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在于能否直接拿来应用。我本来对学问就无所偏好，只要能致知，一切喜爱，因此在这种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正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西汉政区地理》，研究西汉一代二百年间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过程。这在学术上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但在实用上没有什么贡献。当然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研究成果累积多了，有助于理解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的规律，可以成为当前行政区划改革的参考。我后来提出将现行省区增加到五十个左右，就是以对历史政区变迁过程的研究为据的。但这是后话，在做论文时是丝毫未去理会后来的致用目的的。

与治学目的同样重要的是治学方法，也就是用什么方法致知的问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等于否定了历史面貌有复原的可能。的确，可以说有多少思想史家就有多少个孔子，但这种说法与克罗齐那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指诠释历史总要带着主观性而言的。至于复原历史面貌，则应该有客观的标准。当然历史面貌的复原有相当难度，如对于战争的爆发原因，敌对各方的说法一定异，以至有人以为永远不可能弄清楚。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即在于用适当的方法来弄清似乎不可能弄清的历史真相，其次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历史学还有什么学术性可言？何况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如职官，如政区地理，客观性比较明显，只要方法得当、史料充分，是完全可以复原的。但问题在于，由于时间的淘汰，史料或者缺失严重，或者零碎分散，或者没有正面记载，复原难度很大。这时，若无适当的方法，是难以达到弄清历史事实的目的的。

我刚读研究生时，开始并没有想要从事哪一方面专门研究的打算。谭老师也不急于要我们做什么题目，只是让我们随意地阅读史学原著以及前贤的研究文章。同时也不照本宣科式地

上课，而是闲谈，作学术漫游式的引导。这种无为的教育方式使我终身受益，形成了自由独立的学术思想，不唯书，不唯名人，只唯事实。由于从非史学领域来，所以一开头先认真地读了《史记》、《汉书》，并进而读到钱大昕和王国维的历史地理著述。史、汉二书人所习见，即使不治秦汉史者也都烂熟于胸，能有新发现吗？一字一句读去，恰恰就在这两本书当中，发现了有许多历史地理问题可以研究。首先是钱大昕的一个发现震动了我。他注意到，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采用推恩法，分封诸侯王的子弟为王子侯，割诸侯王国的领域设置王子侯国，这些侯国在分封后，就划归该王国周围的汉郡（即皇帝自辖的郡）管辖，这样一来，王子侯分封得越多，该王国的领域就越小。这个发现来自《汉书·中山王胜传》的记载：武帝“令诸侯王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制定封号，辄别属汉郡”。在钱大昕之前千数百年，读史、汉者不知凡几，竟没有人注意到推恩法对诸侯王国的这个蚕食作用。可惜钱氏因治学范围浩博，未曾充分利用这一发现去解决一些历史地理难题（参见本书所收《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中的阳山阴山问题），才使得我有机会做出一些新发明。但钱大昕的高明并未被人充分认识到，时人和今人多将他与其他很一般的甚至差劲的史学家同等看待，我觉得极其不公，所以写了《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一文以表达高山仰止的心情。

钱氏的发现使我想到了，如果我们将别属汉郡的王子侯国还给那些诸侯王国，不是可以复原实行推恩法以前的诸侯王国的面貌吗？我用此法先是解决了一个很小的问题，即推断齐国一个叫做北乡的侯国的位置（这篇文章可以算是我的青萍之末）。进一步则复原长沙王国在汉初的范围。当时距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不久，许多人（包括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在内）都以为汉文

帝时（即马王堆汉墓墓主下葬时代）的长沙国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九县大小，利用推恩法和其他史料的综合考证，才发现汉文帝时的长沙国比汉末（即《地理志》反映的时代）至少大了两倍。我把上述的这两个考证的文章都选入这个集子里，就是为了让读者看到我的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写完长沙国以后，我的野心大为膨胀，就着手将西汉一代所封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国的面貌全部复原出来，这就成了我后来的硕士论文《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的内容。这篇论文在事实上已经将前此的政区变迁研究，从以朝代为尺度转变到以年代为尺度，也就是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由谭老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朝代为尺度表现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的最高成就，但老师以为这部空前的著作只反映了不同朝代之间的变迁，还应有所发展，继续深化，因此对我的论文进行悉心的指导。

因为此项研究是学术上一项较大的空白，由于史料严重缺失，过去也没有人想到解决这个问题（如许多王国经常因诸侯王的犯法而被削地，史书上只记载削二县，削其国大半，至于削的是哪些地方，全然不写，因此考证这些无头公案的过程非常繁复，有点像解决未知数太多而已知条件不够的数学题一样），也因此论文答辩委员会诸委员都认为这篇硕士论文是实际上的博士论文。但文科学术水平的非规范性，使得直接授予文科博士成为不可能事件。一年后，我国又实行博士研究生制度。我以诸侯王国的变迁为基础，扩大到研究整个西汉一代全部政区的变迁，写成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其中要解决的新问题虽多，但最难的是关于秦汉时期象郡的沿革问题。由于《汉书》两条记载的直接矛盾，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上的难点，不但在我国史学界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都长期争

论不休。谭老师深知这一问题的难度，所以对我说，若解决不了，则两说并存。我当时年虽不少而气盛，觉得两存难以为情，到底用一个月时间钻通了牛角尖，确认只有一说正确，那就是：秦汉都有象郡，且其故地在今广西一带，并不延伸到越南中部。这一结论自十多年前发表以来，至今未曾有人提出异议。由于解决这个问题在方法上即如何处理互相矛盾的史料方面有其代表性，所以我也将其选入此集。

前贤中除了钱大昕以外，应数王国维对我影响最大。王氏的《秦郡考》与《汉郡考》是我一再反复研读的名篇。上面已经说过由于我的研究是以年代为尺度，因此不得不考订每个郡的始置年份。据《汉书》所载，汉高帝始置的郡有二十六个，但这个说法被王国维的《汉郡考》完全否定。二千年前的史书记载，被二千年后的史家认为是错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汉郡考》分析透辟，《汉书》的记载的确有问题，汉高帝实不能始置二十六郡。但当王氏举例说二十六郡中，有十郡（其中有定襄郡）尤可确证非高帝置时，我却有所保留，认为有可议之处。如定襄郡就确为高帝之所置。《汉书·高帝本纪》十一年载：“以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这句话要是平常读了也就过去了，但我细嚼之下，觉得话中有话，那就是云中（县）以东未被提到。高帝所置新云中郡只是原云中郡的西半部（即云中县以西部分），云中县以东显然不能空置，必然要设一新郡，这个新郡就是定襄郡。所以由这一记载不但可确定定襄郡为高帝所置，而且还可确定其为高帝十一年置。《汉郡再考》就是读了王氏《汉郡考》以后的反应，虽然对王氏提出批评，但这一批评却是在受他启发之后提出的。

因此如何致知的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我并未去刻意追求研究方法，但我相信我的思维有些偏向，那就是比较偏

向于逻辑思维。与此同时，理工科的训练，工程设计中的方案比较法，对我的历史地理研究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我比较擅长的是将断了环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从人所习见的史料中读出人所未见的结论来。史料缺佚者推理之，史料互相矛盾者化解之，史料分散者拾缀条理之。我所从事的政区地理研究是比较偏狭的学问，知音并不多。当非常艰深的考证终于得出答案时，其时的快乐，除了老师和有共同趣向的同人外，真是不足为外人道。我花了序言的大部分篇幅来谈论治学目的与治学方法，是因为上述所举几篇关于政区变迁的论文过于专门，缺乏可读性，如果有的读者不愿意读，通过序言就可了解我最偏狭的那部分研究工作的大概，以及研究思路的发展过程。

一般人由历史或由地理出身，而进入历史地理研究。我却相反，是从历史地理倒过来进入历史研究。由于最先接触到的原著是史、汉二书，所以历史学成果秦汉史稍多，这里只选《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一篇作为代表。该文是为着解决县乡亭里制度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这个死结而写的，这个死结经中外学者的努力索解，未曾得到圆满解决，自信这篇文章已经将这个死结彻底解开。文中所使用的史料全是旧的，只有见解是新的。但这些见解却反复酝酿了十年之久才诉诸文字，如何正确理解与诠释史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当然对于其他断代史和专门史我也同样感兴趣，如《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既是移民史也是唐史的论文，这篇文章是如何利用分散的史料来揭示暗昧的史实的例子。历史上北方人民比较显著的南迁浪潮有过两次，一次是在西晋永嘉丧乱之后，另一次是在北宋靖康之难以后。但安史之乱以后的移民浪潮因为史料的分散，则不那么明显，以至从未被人提及。通

过这篇文章的揭示，史学界已认同中国历史上确有三次北南向的大移民。

研究移民史意义还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在于对文化变迁的揭示起着锁匙的作用。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的产生就直接与移民有关，但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大部分研究者，历来以为客家的形成是五期移民所造成，我因为有上述移民研究为基础，所以不赞成这一观点，写了《客家源流异说》一文，证明客家人的形成是以一次主要移民运动为背景的。该文问世后，受到海内外极大关注，其主要观点被数十家报刊所转载。上面提到的安史之乱引起的移民运动，既是移民史的同时也是隋唐史方面的论文。近代史虽然重要，而且也是我之所好，但能力与时间所限，只是学着写了一篇《正眼看世界第一人》，以表彰不为今人所重的徐继畲在引进西学方面的贡献。

几乎在做政区地理研究的同时，我还和中文系的游汝杰一起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发表一系列的论文，后来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写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有人以为在这本书中我们两人是各司其职，文化方面是我写，语言方面是汝杰写，其实不然，我们两人互有渗透，每一章节都是经过详细酝酿讨论才写定的。我本人对语言学很感兴趣，天又假其便，使我熟悉了闽、吴、湘三大南方方言，我曾一度想报考汉语史研究生，因自觉把握没有考历史地理学大，才熄此念。大约因为讨论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著较少，所以此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一再重印，直到最近出修订版，仍然一销而空。书的后记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的设想已经得到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响应。我很想就书中提出的一些专题再作深入的钻研，但限于时间与精力，只写了与文化地理研究相交叉的《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和有关中外语言接触的一些文章。

以研究文化的时代差异为对象的文化史，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研究文化地域差异的文化地理却长期未曾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国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的地域差异极其显著，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地域差异与时代差异互相交织，更显其绚丽多彩。因此我在文化地理的主要分支语言地理、宗教地理、风俗地理方面都做了一点探索，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我现在指导的博士生，也是包括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两个方向。

地理学史是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会附带注意的一个方向。我在先师的启发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成就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写了《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目的是说明中国的地理学直到王士性与徐霞客出现才脱离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由于政区地理研究的带动，使我对地方行政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过去的制度史研究历来只注意中央制度而忽视地方制度，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中央地方关系、统一分裂等重大问题。同时又往往将制度史限制在讨论职官与机构的小范围内，没有理解到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我写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志》一书，提出地方制度研究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关于行政区域划界原则与幅员尺度，地方政府组织的层级与等第变迁，过去从未有专著进行论述。这里只选一篇有关的论文《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略窥一斑。受到研究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迁的启发，引起对现行政区改革的一些想法。由于政区承继性作用，使得历史上行政区划的不合理因素延续至今，若不加以改革必然影响现代化建设，这种改革应在多方面进行，但最关键的一点是缩小省区的幅员。本书收入的《行政区划改革的几个

关键问题》的核心即阐明了这一观点。在省级问题之外，市管县与县改市的政策也是我最关心的现实，我的基本思路是这两项改革应该慎行，这一思路在《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中作了发挥。

政区地理只研究政区的变化过程，很少论及这种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更少牵涉变化规律的探讨，这后两方面的研究应属于政治地理的范畴。但政治地理由于 30 年代地缘政治学臭名昭著的影响，一度归于消歇，虽然 60 年代恢复繁荣景象，可是在我国依然没有回响。我在 1990 年曾以《体国经野之道》为名撰写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其实质就是微观方面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只重全球性、国际性的大尺度的研究，缺乏政区一级的微观研究。中国历史上积累大量的行政区划变迁资料，对于政治过程的空间微观研究是一项极为丰富的资源。今后仍打算利用这一资源试写一部比较完善的政治地理学著作。

如果说我的长处在于复原历史面貌，那么我的短处则是缺乏历史哲学观，我对形而上的东西表现迟钝，至多只能做到形而中（这是我的朋友朱学勤的调侃），这就是本书中所选的几篇史论式的文章，如《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假如齐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上的禅让连续剧》、《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等所表达的粗浅思想。但即使只是形而中的水平，也使我比过去未读历史以前聪明得多。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尤其在当今物质世界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学生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从纯粹应用科学的观点看来，历史学的确没有什么用。但历史却有一个最大的功用是别的学科无法代替的，那就是它直接的是让我们了解过去，而间接的却是让我们理解现在，甚至预测将来（当然这一方面并不十分可靠）。因